

#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 再看孔子诗学

罗 怡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关键词:**孔子;《说苑》;《诗》;《孔子诗论》

**中图分类号:**B222.2;I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3-0078-07

21世纪初,上海博物馆陆续公布了一批新发现的竹简资料,其中有31枚竹简,共980余字,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记录文字。从竹简上的记载可以看到孔子这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思想家授徒讲课的真实情景。整理者根据内容将这部分竹简资料定名为《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本文采用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照研究的方法,就孔子诗学理论的相关内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 一、《诗》的作用和“诗言志”的问题

《说苑》是西汉著名目录学家、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编撰的一部重要的文化、文学典籍。其取材十分广博,与先秦两汉诸子之书、史书有密切关系,并可与之相比照、参证。赋诗的风气在春秋甚为流行,

此后逐渐消沉。迟至汉代,在《说苑》一书中我们仍能见到大量的引《诗》内容。据统计,“《说苑》引《诗经》共有91次,共60首(其中17首重复28次,2首不见于今本《诗经》)。”<sup>[1]</sup>有14首见于《诗论》,其中《裳裳者华》与《小明》2首仅存篇题,诗论内容因简残而未能保存下来,其余12首都能见到相关评论。将这12首诗论部分和《说苑》引《诗》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诗学理论。

《说苑·政理》第7章成王问政于尹逸(以下所引《说苑》章节均以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分章为准),尹逸回答成王的问话时引到《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句,同样的一句还见于《敬慎》第1章,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杂言》第1章引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句。《小旻》一诗的诗旨,吴闿生在《诗义会通》中说:“此篇以谋猷回遑为主,而剀切反覆言之,最见

收稿日期:2011-03-0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YFC090077)

作者简介:罗 怡(1986-),男,湖北应城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志士忧国忠愍勃郁之忱。所谓回遘者,非必有奸邪不轨之行,第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臧则具违,不臧具依,发言盈庭而莫执其咎,诬言是争,筑室道谋,斯则诗之所谓回遘矣。”<sup>[2]</sup>这首诗讲的是诗人见周王因不能采纳良言,导致朝政昏暗,而使忠贞之士产生了临深履薄、需要谨慎行事的危机感。《说苑》两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句要表达的也正是一种谨慎自警的意思。“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句出现在《杂言》第1章中,是引诗者借此讽刺那些没有全局眼光、不能全身之人。上博简《诗论》简8:“《少(小)旻(旻)》多愆=(疑矣),言不中志者也。”马承源先生隶“愆”作“愆”,并说:“愆读为‘疑’,有重文符,增语辞‘矣’。《诗·小雅·节南山之什》第五篇《小旻》,内容也是怨愤国家乱象的,‘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孔子评之为‘言不中志’。”<sup>[3]</sup>《诗论》的评价是相当简要和契合诗旨的,是从诗的本身出发对诗进行单纯的文本解读。

### (一)“春秋赋诗”背景下的《诗》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可以说是唯一成熟的文学作品。“诗三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作为社会交际、政治活动的语言工具,“诗三百”具体运用于公卿大夫之间,赋诗言志,表情达意。因此,这一时期《诗经》的社会地位非常之高。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最重视《诗经》,对《诗经》的评论也最多,其诗学理论在先秦诗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上认为孔子教诗和评诗,只是局限于诗的社会作用上,强调的是《诗经》的政治作用和功利价值,着重在“诗外之义”,而非其美学功能,很少研究和探讨诗的本身,包括诗的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就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和认识,孔子才时常督促弟子们学诗。他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能诗,于礼谬。”(《礼记·仲尼燕居》)所论莫不是诗的交际功能和政治作用,无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

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一现象在《左传》中也有颇多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楚薳罢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又《左传·昭公十二年》:“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由赋诗的妥当与否上升到家国存亡与否的高度,诗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崔启坤说:“对周代贵族而言,《诗》就是诗本身,是他们表情达意的方式和工具,而不是审美可供人们欣赏的文学作品。对孔子及其弟子而言,教《诗》学《诗》就是为了学会这种表达方式,学会运用这种工具以达到入仕和参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目的。”<sup>[4]</sup>对此,傅道彬也说道:“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的影响不可忽视,孔子论诗是建立在春秋时代用诗风气的理论背景上的。”<sup>[5]</sup>确实,先秦时期的诗作为处理内政外交时重要的交流工具和传达媒介,在政治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孔子诗学理论带有实用和功利色彩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由于“诗在实际运用中被用作外交活动的特殊语言、谏讽国政的有效工具、切磋道德的诱发因子,诗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密切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巩固国内安定团结的粘合剂作用、推动师友之间互相启迪的催化作用。”<sup>[6]</sup>“因此,在春秋时期,诗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作为一种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赋诗言志、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上。”<sup>[7]</sup>

### (二)“志”的解读

所谓“赋诗言志”就要涉及到“诗言志”的问题。“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以及《说苑·修文》:“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等,都是相似的说法。“志”指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在先秦时代“赋诗言志”的“志”更具体倾向于赋(引)诗者之“志”而不是作诗者之“志”。其时的诗更多的只是一种工具,在应用价值的前提下,从中撷取不多的语句来自由发挥,诗外求义,以为己所用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顾颉刚先生就专门说过:“自己要对人说的话,借了赋诗说出来。所赋的诗,只要达出赋诗的人的志,不

希望合于作诗的人的志,所以说‘赋诗言志’。”<sup>[8]</sup>这样就必然导致“断章取义”的结果。“断章取义”一语,《左传》中已见类似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杨伯峻先生注云:“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sup>[9]</sup>

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诗没有从其本身出发,没有从文学的、艺术的角度和人自身情感抒发的视野来加以看待,而仅仅是被当作一种工具,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加以解读。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诗论》对诗的解读并非如此,这从上博简《诗论》简8“‘少(小)旻(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一句中已然发现了些许端倪。

## 二、《说苑》引《诗》和《孔子诗论》相关内容的比较

### (一)“断章取义”式的“赋诗言志”

今本《诗·国风·邶风》及《小雅》均有《谷风》篇名,《邶风》的《谷风》:“不能我恡,反以我为讎。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写的是一首弃妇诉苦的诗,朱熹《诗集传》:“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sup>[10]</sup>《小雅·谷风》:“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则被认为是一首朋友相弃的诗。《毛序》:“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二诗皆有“背弃”的意蕴。《诗论》简26:“《浴(谷)风》恡(背)。”马承源先生:“浴风,当读做‘谷风’。今本《诗·国风·邶风》及《小雅》均有《谷风》篇名,其评语云‘恡’,‘恡’,从心不声,读为‘背’。以此当属于《小雅》的《谷风》。”<sup>[3]</sup>事实上,其评论为“背”,可以说对二诗诗旨都是契合的,两《谷风》都可以说通。《诗论》的评论是纯粹从诗本身意旨出发来作的解读,不带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说苑·至公》第12章讲述的是申包胥赴秦乞师复楚的故事,引了《邶风·谷风》中的“凡民有丧,匍匐就之”一句来体现申包胥拯楚国民众于水火之大公无畏的牺牲精神,单抽出这两句来看,确无不妥,然而将其置于《邶风·谷风》整首诗的情境中来理解,可以发现这里的“民”指的其实是诗人的邻人,而非国民。对

此,朱熹在《诗集传》中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诗人:“又周睦其邻人乡党,莫不尽其道也。”<sup>[10]</sup>可见,《说苑》在引用这两句诗的时候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引诗者在这里虽然引用了诗人的诗句,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诗人的作诗意图,没有触及诗旨,只是通过字面的“断章取义”随机联想来达到自己的表述意向。这是典型的“春秋赋诗”遗风,所谓的“赋诗言志”的“志”在这里指的自然是引诗者的“志”。

《诗论》第1简说道:“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二者的表述相似,而对于《诗论》中的这个“志”究竟应该理解为作诗者之志还是引诗者之志,我们联系《说苑》,就能看出来它指的应当是作诗者之志。

### (二)具体诗句的对比分析

《说苑·政理》第40章晋侯问士文伯的话中引有“彼日而蚀,于何不臧”一句,系引自《小雅·十月之交》。今本《小雅》此句作“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字词的差异在于表述的形式,而于义无别。晋侯不明这句诗的意涵而问士文伯,士文伯回答说:“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古代人以日食为不祥之征。《史记·天官书》:“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诗人也正是借日食这样一个“不祥”的自然现象来讽刺朝廷用人不善而致政治败坏。士文伯的解释是符合诗人的心理诉求的。《诗论》简8:“《十月》善譚(卑)言。”《诗论》所称《十月》即今本《小雅》之《十月之交》。“善譚言”一语,胡平生先生认为:“愚意‘譚’不仅从卑声,亦是‘卑’之卑小,卑微,非正统之意,卑言乃是下民之言。《十月》诗中屡见‘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哀今之人,胡憯莫惩’,‘下民之孽,非降自天’,它是代表了下民对国家政治,对达官贵人的怨恨之言。孔子说《十月》‘善譚言’,是称赞它善于将下民之言表达出来。”<sup>[11]</sup>对于“譚”字的释读虽然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对于《十月》一诗是抨击朝政、下民愤懑的思想感情的抒达大体是没有异议的。《诗论》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契合此诗诗旨的。

《说苑·政理》第11章鲁有父子讼者引到《小雅·节南山》其中一句“俾民不迷”,其引诗背景在于教导为人君者要正确地引导老百姓,不能使其迷茫。《反质》篇第13章引到另一句“不躬不亲,庶民

不信”，今本《小雅》此句作“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诗句的原意在斥责师尹不亲自管理政事，老百姓因此不信从。《节南山》是一首诗人斥责执政者师尹为政不平的诗，陈奂《传疏》：“今君子不能躬率庶民，则庶民于上之言不肯信从矣。”<sup>[12]</sup>而在《说苑》中，管仲却并非拿这句诗来指责齐桓公，而是以一种淳淳的语气告诫齐桓公要以身作则，率先禁绝奢侈之风，这样臣民才会信从。这当然也是一种“春秋赋诗”的典型。《诗论》简8说：“《即(节)南山》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可以说准确概括了此诗的作诗意图，此诗的潜在所指也正在于此。

《说苑·杂言》第23章引到《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漙者渊，萋萋淠淠”一句，借以说明孔子门生多而杂的原因在于孔子德高望重，宽容对人，就有如茂密的柳林，渊深的池塘，因为大而深，所以无所不容。《小弁》是一首因被谗言所潜而遭父亲放逐的儿子诉苦的诗。班固《汉书·冯奉世传赞》：“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可见，引诗者和作诗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大相径庭。《说苑·政理》第19章另引到《小雅·巧言》中“匪其止共，惟王之邛”一句，后并有“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一句诗论，这句评论尚近于诗旨。《毛序》评论《巧言》说：“《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胡承珙《后笺》云：“盖馋人之言非巧不入，诗人所深恶也。大夫伤于谗者，非独一己伤困于谗，谓大夫伤痛谗言之乱政。故其词屡言‘乱’，而深望君子之能察而止之。”<sup>[13]</sup>《诗论》简8评论此二诗说：“《少(小)弁》、《考(巧)言》则言讎人之害也。”《诗论》中之讎字，诸家说各异，黄德宽、徐在国二位先生认为：“此字应分析为从‘言’‘荒’声，隶作‘詭’，疑为‘流言’之‘流’的专字。”<sup>[14]</sup>“流言”、“谗言”义近，都是不实之言。《诗论》说《小弁》和《巧言》是“言流人之害也”，显然触及到诗的潜在意涵。

《说苑·贵德》首章引到了《甘棠》中的一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而且后附孔子对此诗的评论：“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目的在于说明立德的重要和世人对德高之人的崇敬。《诗论》有3处评论涉及到《甘棠》一诗，包括简10“《甘棠》之保”、简15“及亓(其)人，敬嚭(爱)亓(其)查，亓

(其)保厚矣。《甘棠》之嚭(爱)，以亓(召)公”以及简24“虐(吾)以《甘棠》寻(得)宗庙(庙)之敬。民眚(性)古(固)朕(然)，甚贵亓(其)人，必敬亓(其)立(位)；攸(悦)亓(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朕(然)。”简10的“保”字，诸说各异，饶宗颐先生认为：“‘保’字不必读为‘褒’，亦不必读为‘报’。周颂《列文》、《天作》俱云：‘子孙保之’，《我将》：‘于时保之’。召伯分陕，到过三门峡者，可瞻仰其遗迹。甘棠之遗爱，其保厚矣。”<sup>[15]</sup>姜广辉亦持此说，他说：“‘保’当读本字，意谓‘保民’。《礼记·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尚书·康诰》‘若保赤子’、《孟子》‘保民而王’皆言此义。人们爱召公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其保厚矣’。”<sup>[16]</sup>简15的“嚭”字，马承源先生说：“‘嚭’从虫从悉，《说文》所无。当假为‘爰’，即‘爱’。”<sup>[3]</sup>“查”字“读为‘树’，即甘棠。”<sup>[3]</sup>简24的诗评与《说苑》中孔子的诗评非常接近，另《孔子家语·好生篇》中也有相似内容：“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庙制》篇：“《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隔千年而能互相映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且三者内容如此接近，当有祖本可依。刘向编撰《说苑》时是否见过《诗论》一类的材料，颇值玩味。《甘棠》一诗表现出来的百姓缅怀召公之德的情怀，在《说苑》和《孔子家语》的相关内容中显现无遗。《诗论》在这里显然点明了《甘棠》一诗的潜在意涵，道出了作诗者的思想旨意。

《说苑·奉使》第6章所引“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一句来自《齐风》的《东方未明》一诗。引《诗》的故事背景是魏文侯与太子击相互怨恨，三年中不往来问候。太子舍人赵仓唐主动请求出使魏国，并巧妙地化解了二人之间的矛盾。此后魏文侯想召回太子，但并没有直接下令明言，而是模仿“东方未明，颠倒以上，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中的情景，赐给太子击颠倒放置的衣服，命赵仓唐鸡鸣时至，以此暗示“自公召之”，隐晦表达出自己想见太子的意愿。太子也准确地领会其意，回到了魏文侯身边。《诗论》简17评价《东方未明》说：“有利

词。”马承源先生解释说:“‘利词’句直言朝政无序。”<sup>[3]</sup>刘信芳先生同意马承源先生之说,并进一步解释说:“‘利词’是对《诗·齐风·东方未明》语言风格的准确概括,‘利’之本义谓锋利。”<sup>[17]</sup>《东方未明》一诗是描写一位妇女的丈夫忙于公事,早晚不得休息,借以怨刺为政者使民不时。《诗序》说:“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很显然,“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一句是对这位丈夫急于公事、手忙脚乱的生动描写,《说苑》这里的引用,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为己所用。而《诗论》的评价则是一种与原诗意旨相符的解读。

今本《邶风》之《柏舟》一诗,《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此诗有两句被《说苑》引用,分别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见于《说苑·指武》第27章,表明作者对奸臣小人的痛心,尚能接近诗旨;另一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见于《立节》第3章,要表达的是对坚贞操守的执著,而无涉原诗的怨刺诗旨,显然是“断章取义,为己所用”。《诗论》简26:“《北(邶)白(柏)舟》闷。”马承源先生说:“北白舟,即今本《诗·国风·邶风》篇名之《柏舟》,‘白’读为‘柏’。因《柏舟》有同名,另一在《邶风》,此《北柏舟》特为标其地域为‘邶’以示与《邶风》之《柏舟》有所区别。孔子言其诗意曰‘闷’,也与《邶风·柏舟》的诗句相合:‘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觐闵既多,受侮不少。’”<sup>[3]</sup>言“闷”,正是这种抑郁境遇的心情写照,可以说准确把握住了诗旨。

### (三)“以意逆志”的解诗

《说苑·反质》第4章开篇即引《曹风·鸛鸣》云:“尸鸛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意图在于阐释尸鸛与君子之间的类比关系。尸鸛能专心一致,所以能养七子,为人君者如能采用统一的法度,则能疏理万物,二者都在于能专一。《毛传》:“鸛鸛之养其子,朝从上下,莫从下上,平均如一。”《诗论》简21:“《尸(鸛)鸛(鸛)》虐(吾)信之”,简22:“《尸(鸛)鸛(鸛)》曰:‘元(其)义一氏,心女(如)结也,’虐(吾)信之。”《说文》云:“信,诚也。”上引《说苑·反质》第4章说道:“夫诚者,一也。”《诗论》恰恰与诗文相合!刘信芳先生说:“《说苑·反质》以‘诚’释《鸛鸛》,最与《诗论》以‘信’释

《鸛鸛》相合。”<sup>[17]</sup>由此可见,《诗论》显然是在抒发自己观诗后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一种纯自身情感的解读,不带有实用和功利目的。

《说苑》4次引《大雅·文王》之诗句,其中3处为“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一句,分别见于《君道》篇第20章、《复恩》篇第11章和《修文》篇第15章,均用来说明为人君者得士的重要性,尚与诗旨相近。《说苑·权谋》第37章引到“自求多福”一语,是郑太子忽辞婚的谦辞。《诗论》简21:“《文王》虐(吾)兕(美)之”,简22:“《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昭)于天’,虐(吾)兕(美)之。”《文王》乃《大雅》之首篇,总计由7章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是称颂周文王德行并告诫后代应取法之。由于文王在有周一代是上下同尊的典型,《文王》一诗当然是不吝赞美之词。孔子一直推崇文王之政,对文王当然是赞美有之,故《诗论》评论说:“吾美之”。

《说苑·复恩》第11章引到《周南·兔置》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一句,与《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一句连用,强调得士的作用,要求君主爱惜人才。《兔置》一诗本身是赞美猎人的英姿威武,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保家卫国的人才。《诗论》简23:“《兔置》元(其)甬(用)人剿(则)虐(吾)取。”“取”字下残,其义不明,可能是探讨任贤之道,也就是要重视人才,说出来的正是诗人的未尽之意。

以上3首诗中的“吾信之”、“吾美之”、“吾取”这些词语,表达的都是孔子观诗后的思想态度,是以自己的读诗感受来体会诗的本来蕴涵。《孟子·万章上》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就是典型的“以意逆志”,是一种情感迎合式的审美体味。

## 三、孔子诗学理论的再认识

总而言之,虽然《说苑》引《诗》“赋诗言志”的内容,有以诗旨言志的,也有断章取义的,但其实质还是在“取其所需,为己所用”,并不顾及诗的本身,属于典型的“春秋赋诗”一类。然而,《诗论》中的相关评论都是实实在在从诗本身出发,契合诗旨的解读。孟子说“以意逆志”,就是反对那种“为己所用”的“赋诗言志”,更不能够以表面的文字来曲解诗旨,而是应从诗本身出发来对诗进行解读,重视诗情

的抒发和契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诗论》可以说做到了“以意逆志”。

通过《诗论》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诗不仅仅有传统上认为的重视诗的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对诗本身审美特质、艺术意义进行解读的一面。《诗论》没有像《诗序》那样大量地比附历史事实,借题发挥,随机阐发,而是倾向于重视诗本身的审美特质、艺术情境、思想主旨,也即对人自身情感的强调。可见,孔子诗学虽然强调“诗教”,把诗政治化,但是并没有撇开诗的抒情本质,也有其言“情”的一面。

随着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公布,我们发现孔子也有重视《诗》本身的一面,他对于诗旨、诗情的揭示是很到位的,对诗境的赞叹和陶醉也是之前我们所不了解的。相较于《诗序》,彭林说:“《诗序》的主旨,是在介绍‘言诗之外’的材料,而不在‘诗文之中’。这就决定了《诗序》的文字大体不会深入诗的本文。……《孔子诗论》的重心是论述《诗》的思想内涵,着重在《诗》的本身。”<sup>[18]</sup>几千年以来,孔子给人的印象就是庄肃的政治家,评诗教诗都是带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现在看来,孔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并没有完全以实用、功利的角度来对待诗,他也注重诗的文学价值、艺术特征和抒情本质。虽然传统上认为孔子是以政教目的来评诗、教诗,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诗人的情感抒发和诗歌题材的发掘,使得诗歌的发展不断受到梗阻,直至魏晋,经学衰微,传统上的孔子诗教的教条框框被打破,诗歌才得以复兴和繁荣,但事实上孔子诗学并没有忽略诗吟咏情性、抒发心灵本质的一面。对此,萧兵在《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一书中有精辟的评述,他说:“在‘肯定’诗歌的政治作用,‘专对’功能,美刺倾向,应用价值的前提下,中国诗学史隐隐有‘两条路线’在并行,在冲突,在交错:一派强调‘诗言志’的志意义,强调《诗》的政治性教化和伦理功能,以毛郑等汉儒为代表;一派就是由《孔子诗论》在默默地涌动的‘暗流’,强调‘诗言志’的情志义,重视《诗》的艺术、抒情和审美功能,到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喷薄而出,蔚为洪流。”<sup>[19]</sup>这个说法应该是中肯的。

## 四、结 语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不世出的奇珍异宝,它的

核心内容告诉我们,孔子对于诗有其言“情”的一面,而不同于汉儒迂说。与《说苑》中引《诗》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这一点更加显露无遗。出土文献在地下沉睡千年,未经后人窜改增补,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献的原始面貌,这对于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写学术史,其影响必将十分深远。

## 参考文献:

- [1] 谢明仁.《说苑》引《诗经》考[C]//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22-324.
- [2] 吴闿生.诗义会通[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 雒启坤.《诗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J].文艺研究,2002,27(2):39-45.
- [6] 梁道礼.孔子诗学的现象学还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2(1):11-18.
- [7] 申红义.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实用主义理论特色[J].中州学刊,2006,33(4):195-196.
- [8]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1] 胡平生.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札记[C]//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5-16.
- [12] 陈 旻.诗毛氏传疏[M].台北:广文书局,1956.
- [14] 黄德宽,徐在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释文补正[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2(2):3-15.
- [15] 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EB/OL].(2002-09-12)[2010-11-25].<http://www.jianbo.org/Wssf/2002/raozongyi01.htm>.
- [16] 姜广辉.中国哲学第24辑经学今诠三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 [17] 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 [18] 彭 林.《诗序》、《诗论》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19] 萧 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Reanalysis Confucian poetics from the poems in *Shuo Yuan* and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LUO Q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poetics, the author carries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unearthed literature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and handed down resource of *Shuo Yuan*,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ent of *Shuo Yuan* from *the Book of Songs* is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nfucius poems. However, from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his understanding of poems had practicability, utilitarianism side, and more important is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was from poetry itself to reve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and poets own feelings from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to *Shuo Yuan's* introduction from *the Book of Songs*,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artistic value were equally emphasized on poems, particularly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way to explain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Book of Songs* is clear.

**Key words:** Confncius; *Shuo Yuan*; *the Book of Songs*;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

(上接第 77 页)

## Research on the types and usage of Chinese ancient net based on ancient writing

SHAO Y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nets were the important tools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net patterns and its structures on the utensils with the help of oracle inscription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earlier Qin docume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no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cient net tools and the modern ones. The ancient net tools had three typ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usages were clear.

**Key words:** net tool; ancient writing; oracle; fishing and hunting